

对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理论遭遇的反思^{*}

卜祥记 陆雪飞

[摘 要] 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的有关争论,并对之进行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选择合适的反思路径去对待任何一种有争议的理论或学派,也有助于确立理论创新的路向。正如当初针对《21 世纪资本论》所展开的激烈争论那样,人们把反思的矛头指向它是否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构成真正的理论挑战,这样的理论反应既具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立场性的本能式反应特点,也有其基本性的合理性特点。换言之,如果皮凯蒂的理论对《资本论》的理论内核构成本质性的挑战,那么对其展开立场性的批判当然是必要的,在这里出现的是以理论问题为导向的批判。但是,如果一种外来的思潮或学派聚焦于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不论它用于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是不是我们所认同的,在对其理论工具做出适度反应的同时,我们对这一思潮或学派的更重要的关注点,应当是它所指向的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这一方案的可借鉴性价值。

[关 键 词] 21 世纪资本论 新自由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 资本论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7.01.025

随着一度成为国际性理论热点的《21 世纪资本论》逐步淡出学术视野,“皮凯蒂现象”也已成明日黄花。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以“皮凯蒂问题”未经深入反思、并依然成为最紧迫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为前提的。因而,就其如此之快地花开花落而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大致说来,反思可以从两个路向展开:其一,皮凯蒂理

论的不彻底性及其与“皮凯蒂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二,“皮凯蒂问题”的国际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的嬗变”[项目编号:13BZX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挑战与反响：两面不讨好的“新自由主义者”

在阅读《21世纪资本论》之后所写的评论——《皮凯蒂的三幅面孔》一文的最后，克里斯·格雷戈里以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结尾：“这本大部头的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也能激怒读者，更能激发他们思索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的重要问题。至少，这一点影响了我。这就值得读三遍。”^①这一言论激怒了好多读者。那么，这里所谓的读者究竟是哪些人呢？

（一）被激怒的新古典经济学

2014年5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的经济新闻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发表了《21世纪的资本的数据问题》，对皮凯蒂书中的数据提出了几点质疑。克里斯·贾尔斯认为：“如果某人宣称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进而预测这将会导致财富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并利用近年财富不平等程度貌似加剧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那么数据就对该书的论点非常关键。”但是，纵观《21世纪资本论》，有问题的数据所占比例高达八成以上。^②

然而，克里斯·贾尔斯对皮凯蒂的质疑实际上不是针对表面数据问题，而是皮凯蒂的立场问题——他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让我们想起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与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的相关观点。当里根总统的首要经济顾问马丁·费尔德斯坦回应那些反对里根经济政策的观点时，他认为：“在本国为什么会有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出现，是个谜，不仅如此，我们也正在花费时间、精力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问及我们是否担心华尔街的人们以及篮球明星正在赚取巨额财富时，我的答案是否定的。”^③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也曾指出：“对于那些有损于健全经济学的趋势来说，最为引人注意的，而且我认为最有毒害的，就是以(收入)分配问题为焦点。”^④在国内，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基于类似立场对皮凯蒂的批评。如国内学

者许小年认为：皮凯蒂本可以对遗产做实证分析，但他所提出的“资本税”的再分配方案则必将抑制、扼杀而不是激励创新。财产的继承是可以作为憎恨和惩罚的对象，但不加区别的对资本的厌恶与批判无助于研究的深入。^⑤

皮凯蒂在克里斯·贾尔斯以及一些国内学者这里所遭遇的批评，源自于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信念的挑战：第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挑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与分配问题有关，但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或者哲学的核心课题，只有财富的创造才是经济学唯一真实的研究对象，因而如何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创造出不断增长的财富才是经济学唯一真实的问题域。因此，我们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原则中一再看到效率与公平原则的“二元分离”以及“效率优先”的理论诉求。这样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诉求被新古典经济学看做是毋庸置疑的信条。因此，当皮凯蒂把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并把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其理论研究之旨归，进而提

① Chris Gregory, "The Three Faces of Thomas Piketty", *Feature*, Vol. 10 (2014), p. 28.

② 1. 平均数据问题：皮凯蒂不应该对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数据简单地求平均值，用来代表欧洲。2. 数据缺失问题：从1870年到1960年的整整90年间，没有美国10%的富人占社会总财富比例的原始资料。3. 美国数据问题：皮凯蒂选择将数据依据从遗产税记录转向“消费者财务调查”，而劳动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在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皮凯蒂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美国中产阶级》一文中，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此期间实现了35%的增长。4. 英国数据问题：皮凯蒂关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的财富的长期时间序列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研究，2005年之前，还有英国国税局的数据作为补充。2005年后，英国国税局并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英国相关部门也不再发布此类数据，因为觉得不可靠。此外，贾尔斯认为，2010年的数据也存在问题。皮凯蒂在书中选择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的遗产税记录，而不是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财富与资产调查”中的数据(Chris Giles, "Data Problems with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Vol. 5 (2014))。

③ Martin Feldstein, "Grounded by an Income Gap", *New York Times*, Vol. 12 (2001).

④ Robert Lucas, Jr., Paul Krugman, "Why We're in a New Guilded A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9 (2014).

⑤ 许小年：《〈21世纪资本论〉：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载《历史学人》2015年第3期。

出全球累进税制时,他的全部理论设计遭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满与批评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所有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集中指向皮凯蒂的理论方案必然遏制创新动力、阻碍财富涌流批评。第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背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主要由以下四点构成:其一,自由竞争会自发形成充分就业,就业不充分是由市场的不完全自由竞争或政府干预导致的。其二,自由竞争会自发促成收入平等。其三,收入不平等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级差、受教育机会以及相应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娴熟程度的差异(库兹涅茨曲线)。其四,适度的不平等完全是良性的。

但是,在皮凯蒂基于大量数据所做的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两个理论假设则是不成立的。这一研究结论既是皮凯蒂激怒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他博得左派经济学家赞誉的原因所在。譬如,在《皮凯蒂关于资本与不平等》一文中,纽约城市大学珀斯特·克莱尔(Post Charlie)在谈到某些左翼思想家对皮凯蒂的评价时指出:“左翼评价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时提到了两点:其一,皮凯蒂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分析,不愧为 18 世纪晚期以来大多数财富不公平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与社会运动中的弹药。其二,皮凯蒂远远不只是反资本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作为法国左翼激进分子的子孙,皮凯蒂至少是左翼社会主义的成员……”^①

(二) 不满意的左派经济学家

毫无疑问,《21 世纪资本论》实现了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基本理论假设方面的转向和逆转,它在激怒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同时自然也博得了左派经济学家们的赞赏。但是,在左派经济学家看来,皮凯蒂并未彻底贯彻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立场和理论原则的批判精神,因而尚未达到其应有的理论彻底性,即它还不够“左”。在格雷戈里的书评中的“二读《21 世纪资本论》”部分中,我们直接看到了左派经济学家对皮凯蒂的这一评价,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雷戈里把皮凯蒂称作“两面派”。而在“三读《21 世纪资本论》”这个部分中,

格雷戈里对皮凯蒂“不够左”的判断就更深入、具体和明确了。格雷戈里认为,皮凯蒂不只是“两面派”,而是有“有三幅面孔”,即“在发达国家财富分配方面,他是位政治经济学家;在回答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时,他是主流经济学家;在收集整理收入分配的数据时,他是国民收入会计师。他的原创性与重要性在于第三幅面孔。”^②换言之,格雷戈里认为,皮凯蒂虽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域和基本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但纵观其整体理论规划,它并没有真正超越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真正恢复 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福斯特也持有基本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皮凯蒂所提供的基本数据和基于数据分析对分配、公平等问题表现出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但是它并未实现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决裂,或者说这种决裂只是局部的、不彻底的和不完全的。^③

具体说来,新左派经济学对皮凯蒂的不满与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据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但皮凯蒂仅仅满足于用数据证明不平等的经济事实,这是有局限性的。其次,即使这种证明很有理论意义,但对作为经验事实的经济不平等根源的分析则更为重要。而皮凯蒂的分析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数据,并未把对不平等及其根源的分析引向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性的维度。最后,皮凯蒂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现状及根源的分析,不论是从视角的选择还是从分析的深刻性来说,都远未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水平。

(三) “某种意义上”的理论挑战

皮凯蒂所激起的理论反响绝不局限于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阵营,但《21 世纪资本论》的确已经并且可以构成某种意义上的理论挑战。我们之所以把这一“理论挑战”称作“某种

① Post Charlie, “Piketty on Capital and Inequality”, *Against the Current*, Vol. 5, 2014, p. 28.

② Chris Gregory, “The Three Faces of Thomas Piketty”, p. 28.

③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Michael D. Yates, “Piketty and the Crisi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Review of the Month*, Vol. 11, 2014, p. 9.

意义上”的挑战,有两个原因:其一,无论是在左派经济学家还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理论挑战都是不彻底的,它既没有斩断不该继续保持的理论关联,也没有彻底发挥应有的理论进展。其二,皮凯蒂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具有独创性。运用大量的数据,他所揭示的乃是一个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经济不平等的事实,而对这一事实的分析则运用了适合于他的理论需要、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改良的理论工具——这些理论工具作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左派经济学体系内。

如果考虑到《21世纪资本论》曾经造成的“皮凯蒂现象”及其所引发的理论反响和民众效应,我们就必须积极地回应这一挑战。基于国外对这一挑战曾经做出的如上回应,在“皮凯蒂问题”依然存在而“皮凯蒂现象”已经渐渐淡出学术视野之后,我们就可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了。这一思考不应再度指向皮凯蒂的理论本身,而应该指向我们反思皮凯蒂理论的方式,指向我们反思皮凯蒂理论的意义何在。据此,对任何理论现象的反思都应该划清如下反思方式——基于并为了捍卫某种理论立场的回应与基于并了解决特定现实问题的回应之间的界限;前者属于必要但并非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的回应,后者则属于必要并且至关重要的现实回应。

二、必要但并非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的回应

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就皮凯蒂所引发的争论而言,我们虽然不能把现实中的不平等直接地归结于处于激烈对抗中的理论主张的后果,但对现实不平等问题的诊断和治疗却需要一个恰当的理论解释方案,因而需要对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给予再思考。然而,我们之所以把由“皮凯蒂热”而引发的“基于并为了捍卫某种理论立场的回应”,看作是“必要但并非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性质的回

应”,则是由皮凯蒂理论的折中主义性质决定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造成“皮凯蒂热”,就其民众效应而言,乃是由于他以一种表面上属于实证科学的、实则是折中主义的形式,把公众的眼球聚焦于不断加剧的敏感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就其理论效应而言,乃是因为他以鲜明的折中主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触碰到但却没有颠覆性地重构那些久已存在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的众多基础性理论问题。正是它的折中主义性质本身,既决定了它必然会遭遇到来自不同理论阵营的回应,也决定了回应的非至关重要性。就此而言,我认为,如果说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应尚属得当,那么以福斯特、格雷戈里,尤其是克莱尔等为代表的“左派”经济学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态度就是“过度反应”或“反应过度”了。

第一,《21世纪资本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但本质地说来它还并不能被看做是一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著作,因而也并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内核,那么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则几乎完全回避或者未涉及这些重大的理论课题。换言之,它只是运用庞大的数据体系验证了作为经验事实的不平等问题,并据此去讨论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问题,但并未涉及财富的创造,因而回避了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原则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一系列问题。

以剩余价值论为例,在马克思看来,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其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数据的统计分析,皮凯蒂以“ $r > g$ ”论证了资本与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且在大部分时期不断加剧的事实,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马克思的结论。但是,在皮凯蒂的分析框架中,广义上的资本等同于财富,所谓资本的收益率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率以及与此相关的贫富分化就是在这—广义资本的基础上展开的。就此而言,皮凯蒂所讨论的贫富分化是无关乎劳动的,而仅仅与分配有关;它也无关乎阶层或阶级关系,而

仅仅与阶层内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有关。而且,在这里,财富的分配与劳动收入以及是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根本没有关系。只有当皮凯蒂涉及狭义上的资本,即作为“租金”的资本或者“纯粹资本”时,资本的收益才与劳动收入成为直接的对立面,但他依然不去讨论资本的收益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皮凯蒂看来,任何财富只要积累到一定程度,都可能转化为纯粹资本,而对于纯粹资本而言,它的所有收益(租金)都直接地表现为“钱生钱”。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在外延上被缩小了,资本的收益与劳动无关,与对他人劳动的剥夺也无关,即皮凯蒂根本不去讨论钱何以生钱的实体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当皮凯蒂涉及劳动问题时,劳动与劳动收入的外延则被大大地扩大了。劳动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而是指一切可以获取工资收入的活动,劳动收入则是涵盖了金融高管的巨额工资收入在内的一切收入,即凡是不属于财富租金收入的都可以归为劳动收入。如此一来,剩余价值论所针对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变成了外延绝对缩小的“纯粹资本”与外延绝对扩大了劳动之间的关系,即变成了“食利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皮凯蒂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回答财富的本来来源,还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新问题——我们很难实际确定食利者与劳动者的边界,因为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有可能同时就是食利者。实际上,正如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只要本质性地解决了财富的本来来源,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前提,也就自然而然地破解了皮凯蒂的如上理论难题——与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与劳动的界限不同,今天的劳资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但是,任何形式的食利者的收益,包括劳动者的租金、股权收益之类的“利”,仍都不过是对剩余价值的分享而已,除却权力资本的非正当因素以外,金融高管的工资收入也大致应该归属于复杂劳动的报酬。

既然皮凯蒂的问题域并不与《资本论》重叠,他也因此回避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的基础理论问题,因而并不真正构成对马克思

《资本论》的挑战。

第二,迄今为止,左派经济学家对皮凯蒂的批判方式和批判宗旨大多是基于并为了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这也表现出反应过度的性质。如果站在《资本论》的理论立场上通览《21世纪资本论》,那么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赞同国外左派经济学家对皮凯蒂的指责——皮凯蒂的确不懂得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他对不平等根源的分析的确缺乏对资本主义政治与历史的分析维度,也确实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阶层或阶级关系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其他一些与马克思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相悖的判断——比如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等。

但是,当我们进行着这样的对比分析并对皮凯蒂发起无情批判时,其内在宗旨何在呢?通过这样的批判,我们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至少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批判的宗旨与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并借此论证《资本论》的核心论断没有过时,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意义。必须肯定的是:这样的批判与论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责任。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批判与论证远非最要紧的。实际上,对于福斯特、格雷戈里以及克莱尔的批判与论证方式,我们一向是非常熟悉并且非常擅长的。作为一种标签式的格式化分析方式,在其极端表达形式上,它总是毫不犹豫地试图化解任何可能的理论威胁与挑战,却既不关注既有理论的发展与推进,也不关注理论威胁与挑战本身所指向的现实问题。在其温和的表达形式上,它或许试图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拓展与充实提升它的解释力,但却回避了对固有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破解。对于皮凯蒂这样一个远非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核构成真正威胁的理论对象而言,这样的反应不仅是过度的,而且是不得要领的。

就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而言,当人们在皮凯蒂的“ $r > g$ ”这一判断中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个非马克思性质的理论命题时,某些学者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捍卫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一个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学

者,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这样的理论内核不仅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更有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历史性等,放弃其中任何一个理论要素——比如否认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从而把资本逻辑看作是支配人类社会运行的永恒原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将受到本质性的颠覆性冲击。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反应常常表现为本能式的行为,它根源于一个特定政治时代的理论研究模式;作为一种政治本能式的反应,它常常表现为对一切异质化理论的本能性拒斥;因此,这样的理论捍卫工作沦落为“为捍卫而捍卫”,即基于某种理论立场并且为了捍卫某种理论立场而来的捍卫,而对于他的批判对象所指向的现实问题以及这一现实问题在中国的存在方式与破解之道则没有兴趣。这是一种必要但并非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性质的回应,也是一种不得要领的过激反应;根据这样的反应原则,中国在收入分配领域所表现出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就只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被归结为一个伪问题,或者被归结为比皮凯蒂的“全球征税”更为浪漫主义的路径——消灭资本。

三、必要并且至关重要的现实性回应

如果我们意识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并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内核构成真正的挑战,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分享着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因而依然归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路径的理论著作,那我们就应该迅疾改变我们的理论应答方式。只要变换理论的反思视角,我们就会对皮凯蒂的理论采取更为合理的态度。这种新的反思视角和更为合理的态度显然应该是“基于并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现实性回应”,即应当集中于皮凯蒂的理论方案对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启迪所在。这才是必要且至关重要的应有回应,也是我们之所以关注《21世纪资本论》的真实意义所在。

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本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如何破解这个全球性难题,这才是我们

关注皮凯蒂的应有基点或着眼点。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序言中写到的:“中国读者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甚至以为目前欧美这种日益增长的对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仅限于发达国家,这些富国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中国的要务是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保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迅猛势头,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这恐怕是完全想错了。”^①皮凯蒂认为:“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②按照皮凯蒂的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谁也说,但至少足以肯定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能继续置之不理。”^③在2009年就已经发表的《中国、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与累进收入税,1986—2015》一文中,依据1986—2003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皮凯蒂和布朗大学经济系教师钱希筠(Nancy Qian)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在中国,收入税已成为大众税,而在印度却仍然是精英税。“在中国,收入的快速增长和所得税的低起征点相结合,使所得税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快速增长,而印度不断调整免税额和税收区间,妨碍收入税充当有力角色。据我们估计,中国缴纳收入税的人口比例从1986年的不足0.1%增加到2008年的大约20%,而印度却徘徊在2%—3%左右。中国所得税岁入激增,从1986年占GDP的不足0.1%到2005年的超过1.5%、2008年的2.5%,而在印度,所得税岁入却停留在占GDP的0.5%左右。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的所得税岁入到2015年很可能超过GDP的5%。”^④第二,与印度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增

① [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④ Thomas Piketty and Nancy Qian, “Inequality and 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Vol. 1 (2009), p. 54.

长更快。“中国在 1986—2003 年真实人均 GDP 几乎增加了 200% (每年 6.4%), 印度则略少于 80% (每年 3.3%)。当考察收入的等级差别时, 我们会发现这种差别的增长趋势变得更大。……按照我们的估算, 中国收入最高的 1% 富人, 1986—2003 年间所占份额增加了 120% 多, 印度则接近 50%。”^①

其次, 虽然经济不平等问题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各自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却有所不同, 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关注皮凯蒂理论的聚焦点所在。就此而言,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 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 在中国, 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究竟何在? 我们注意到, 除了在东西方普遍存在的食利者、遗产承袭等因素外, 皮凯蒂也已经触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比如, 他也曾简单地提及政治权力、违法乱纪、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等因素在引发经济不平等过程中的作用。皮凯蒂不仅提到“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②, 同时还指出: “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 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在中国, 尽管与前苏联国家相比, 做法没有那么极端, 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但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 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 有时却让个别别人借此暴富。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③但是, 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还只是略有触及, 至于政治权力、遗产承袭和违法乱纪等因素究竟如何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它们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这是亟待国内学者深入研究的, 而且这种研究必须基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以及金融、税收、财政等学科的协同创新。此外, 在关涉到中国当代不平等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时,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资本逻辑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式, 即“官本位”的官僚政治体制与资本力量的联姻、弹性社会关系体系与资本逻辑的勾连、阶层结构的固化与资本原则的捆绑等

因素。^④

第二, 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基本措施以缓解或遏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中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资本逻辑的本性, 还有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对经济活动的不良投射 (权贵资本主义现象)、遗产承袭制等制造出起点上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固化 (富二代与承袭制资本主义现象) 以及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等。那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实践中, 面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经济事实, 侈谈消灭资本显然只具有抽象意义, 实际上乃是一个毫无现实意义的理论维度。我们今天需要资本与市场, 而且只要具有良好的制度设计, 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恶化是完全可以矫正或规避的。因此, 问题的解决就应该聚焦于制度设计和制度改进的现实层面。正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皮凯蒂“全球征税”主张的意义所在。然而, 抛开皮凯蒂这一主张是否可行以及是否适用于中国不谈, 仅仅由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单纯的税制改革显然也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累进税制的优化, 甚至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或政治体制改革等任何单向度的领域, 我们需要的是综合性、全方位的制度改良和制度设计, 而且这个决断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中国所面对的贫富分化正在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趋势, 而且在中国经济不平等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大问题。

第三,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一个争论多年但却一直没有妥善解决的老问题, 皮凯蒂理论的意义就在于, 作为一个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土壤的新自由主义者, 他再度把这一问题呈现出来, 从而引起了新古典经济学、左派经济学、新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① Thomas Piketty and Nancy Qian, “Inequality and 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p. 60.

② [法]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第 18 页。

③ 同上。

④ 卜祥记、张玮玮:《马克思“社会公正”理论的当代意义》, 载《哲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

之间的激烈争论。严格说来,这个争论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案,原因在于:其一,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政策问题,它实际上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及其学科域之间兼容交叉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也涉及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理论立场问题,更涉及作为这一理论立场之基础的现实立场——资本与劳动——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的多样化理论嬗变,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同时激怒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左派经济学家,就是一个明证。其二,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效率与公平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需要不同的效率与公平范式。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不同阶段,我们在初期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在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经济事实日趋尖锐化的时期,我们开始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既强调效率又强调公平。历史地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效率与公平范式都是合理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决策和实施层面,我们如何排除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干扰,真正做到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既强调效率又强调公平。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施政原则,又考验着执政党的施政艺术。

为此,学术界必须深思如下几个技术性问题:其一,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如何确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危险临界点。作为传统的衡量手段,“基尼系数”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①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同样的临界系数可能会面对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它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规范等众多因素对人们的约束力直接相关。因此有没有一个比现行“基尼系数”更为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其二,如何确定资本逻辑的运行边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资本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是中央的基本决策。但是,市场的自发运行会导致市场失灵,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一个

理论常识。作为矫正资本本性和市场后果的重要手段,公共品的社会供给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触及政府必须为资本逻辑和市场行为划定边界,并合理确定政府行为的职责范围,这是既不影响市场效率,又能有效缓解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那么,如何具体并分阶段有步骤地划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卜祥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雪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刘成军)

① 正如赵修义教授借鉴皮凯蒂的观点指出的那样:“基尼系数”把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混淆起来,其后果之一就是容易把注意力放到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上面,把贫富差距的问题仅仅视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聚焦于“增量改革”上,一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改善民生的举措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存在着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社会里,仅仅关注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况且劳动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别,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等所不可或缺的,所以其调整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参见赵修义:《租金,承袭制与社会公正》,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